

从文化遗产的视野来评价林则徐的伟大历史贡献

□ 陈支平

摘要:林则徐是被近现代学者尊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伟大历史人物。经过一百年来对于林则徐的热点讨论,我们应该在以往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传承的视野中来考察林则徐的伟大历史贡献及其地位。虽然说,林则徐在当时对于“睁眼看世界”的深度和广度是有限的,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反思与启蒙远不如他的后辈们来的完备和具有系统性。但是,他继承了自宋代以来朱熹、李贽等所秉承的勇于创新进取的文化精神,率先突破固有的文化思维,探索新的适应时代变化的图强之路,其艰辛困难是后人所难于想象的,其阻力的强度是后来者所无法比拟的。正因为如此,林则徐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中国传统主流优秀文化传承重要转折时期的“筚路蓝缕”之功,应该被永久地载入史册,为我们后世所敬仰和继承发扬。

关键词:林则徐;文化精神;突破传统;创新进取

中图分类号:K295.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5)09-0079-05

林则徐是被近现代学者尊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伟大历史人物。一百多年来,林则徐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和杰出英雄的代表之一,受到人们的敬仰。学界更是不遗余力地从林则徐的个人品德、爱国情怀、为官治平、抵御外侮、图强变革等各个方面,论述了他的丰功伟绩与深远影响。近些年来,少数人出于标新立异以博一己之名的目的,无端对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林则徐有所苛责,例如指责林则徐不懂“国际法”、在与西方商人的交往中里外不一等等。这种指责,已经远远超出了历史学本应恪守坚持的“把历史人物事件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中去考察研究”的基本原则,不适合与之进行学术的讨论。然而,我们也似乎应该意识到,经过一百年来对于林则徐的热点讨论,如何在以往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把林则徐的学术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无疑还是应当引起我们思考的。我认为,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传承的视野中来考察林则徐的伟大历史贡献及其地位,或许是我们今后可以努力探索的一个方向。

我们要探讨林则徐在中华文化遗产历程中的历史贡献及其地位,首先有必要对近千年来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演变过程作一简要的回顾。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时期,近代史家往往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唐宋变革时期”。一方面,唐宋时期社会转型及其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整个社会的“平民化”或“市场化”程度的推进,汉唐及之前的

作者简介:陈支平(1952—),现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诸侯门阀士族的社会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与之相适应的“宗法”世袭体制也分崩离析,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从文化精神演变的进程看,儒家知识分子赖以坚守的文化精神“道统”,受到了唐代后期藩镇强权政治的猛烈冲击,一度式微。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宋代许多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理学家们,以恢复所谓儒家“道统”为己任,根据这一新的时代特征,为当时的国家、社会和个人,都设计了深具儒家传统的道德标准,同时也为宋代的社会重构和组合设计出了诸如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一系列的蓝图。

这其中,朱子学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文化标志。朱熹其在世时是以清议的本色而屹立于闽中的。南宋时期,中央政府偏安于半壁江山,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学术,均弥漫于腐败昏庸之中,以朱熹为代表的一批福建学人,目击国家的衰败与世道的沉沦而痛心疾首。他们著书立说,批评朝政,很快引起了国内正义之士的注目与拥戴,而朱熹本人也成了一些当权者的眼中钉,被斥为“伪学”,屡屡遭到政治迫害。朱熹的学术思想虽然摆脱不了“托古改制”的老路,但是他那种敢于突破不合理的传统,敢于面对权贵,坚持自己的道德标准而与当权者相抗衡的性格,全力重新建构“政治文化”与自身“内圣”修养的尊严而可贵的“道统”,这种“道统”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增添了许多不可忽视的积极因素,从而把宋代理学家的道德理想,推进到极致的顶峰,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子学的形成,可以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伟大贡献。而这种反思与自觉的核心,就在于勇于突破旧的文化传统思维,创新出一整套足于指导并适应南宋社会文化发展的新学说。学说的创新性,势必与旧的体制发生严重的冲突,这既是朱熹本人屡遭厄运的根源所在,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他的创新学说对于当时社会政治体制的冲击以及对于后世文化的重大启迪意义,标志着中华主流优秀文化在宋代的传承与弘扬。

但是,以宋代朱熹为代表而极力推行的这种尊严而可贵的“道统”,到了明清时期演化成为统

治者的政治意识形态之学,这对理学、朱子学本身而言,并不完全是件好事。统治者需要理学、朱子学来维护自己的政权统治,势必对原有的理学、朱子学有所取舍、有所改造。特别是随着明清时期皇权专制体制的强化和官僚阶层庸化的加剧,朱子及理学家们所提倡的勇于坚持士人气节的义理观,基本没有被实施实践的可能性。朱子学、理学的“义理”“气节”主张,基本上成了政治上的一种“摆设”,从而也给后世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①朱熹生前历经磨难,身后却备受推崇,被明清统治者奉为理学正宗,支配中国思想文化界达六七百年之久,这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言,是出于后世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与朱熹坚持批判创新的人文精神毫不相干。

当宋代理学与朱子学在明清时期日益成为统治者的政治意识形态之学并且日趋保守的情况下,明代李贽卓吾之学的出现,是继宋代理学与朱子学之后的又一个思想文化的新突破。明代后期卓吾之学的出现同样也不是偶然的。研究明清历史的学者普遍认为,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进步,商品市场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其在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大量的基层商业市镇不断涌现,并且形成了许多带有地域经济特色的商帮集团。其在海外贸易方面,私人海上走私贸易已经超越传统的政府朝贡贸易体系。随着十五、十六世纪西方殖民者对于海外市场的探寻与开拓,东西方的商业贸易日趋密切,形成了所谓的“大航海时代”。在这样的新的世界贸易格局形成过程中,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福建沿海的海商集团及其贸易活动,已经日益参与到世界贸易的网络之中,成为中国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力。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李贽及其学说的出现,就不单单是其个人的学识修养问题,而是体现了时代变迁的一种全新的文化思考。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反思传统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思

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福建泉州的李贽。李贽出身于一个典型的汉回结合的商人家庭,从小在沿海浓厚的海商气氛中受到熏陶。作为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他敢于冲破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卑孔叛圣,对传统儒家经典著作采取批判态度,重新评价历史人物,提倡童心,要求思想解放,这对于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禁锢人心”是一个大胆的冲击,在严密思想封锁的历史长流中,迸发出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我们在上面论述到朱子学的宝贵人文遗产之一是宋儒们对于民间社会规范秩序的建构,道德义理的实施应当更为扎实地在民间社会得到推广。其实我们从李贽的著名的尊重个体的人本主义以及“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等的论述中,已经可以看到两位不同时代哲人对于民间社会及其伦理文化的高度重视。从这点上我们也许可以说,朱子学与卓吾之学是相通的,而不是相悖论的。李贽在明代后期所向往的社会及其道德属性,是一个充满着人性自然与本真心境的更加庶民化的理想国。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李贽等人的这种新的人文思想,并不能在当时的时代里得到顺利的滋长,李贽本人被迫害致死。但是他的影响却在外国或在数百年后的祖国发挥进步作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吉田松阴,自谓在生死观上颇得力于李贽《焚书》的启发,在日本民主革命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后至五四运动时期,吴虞等人也曾引用李贽的学说作为反传统斗争的思想武器。^②这一切都说明了作为福建人的李贽,有着极为执着而深远的创新求变的人文精神性格。这种创新求变的人文精神,虽然不容于专制体制日益严密的明清社会,但是他所具有的超越时代的敏锐学识,却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足于思考与借鉴的宝贵文化遗产。每到中国社会即将出现重大变革的时候,敏锐的文化思想家和革命家们,都会想起李贽之学的重要性,试图从卓吾之学中寻找社会变革的文化精神养分。

清代中后期,中国的传统社会,特别是政治与思想体系,进入日益衰败的没落阶段,而西方殖民主义者则以其资本主义的新兴力量,用船坚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的帝国遭遇“数千

年未有之巨变”,进入到“苦难深重”的危急关头。在暮气沉沉的中国文化思想界,同样也迸发出少量极为可贵的、勇于创新探索的儒者,而这在无数的儒者中,福建籍的知识分子们无疑是开风气之先的一个重要群体。福建一直是中国与海外交通的一个重要窗口,一座沟通中国文化与海外文化的桥梁。鸦片战争后,注重经世致用的福建知识分子,最早意识到打破墨守成规、抱残守缺文化思维的急迫性和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很快把注意力从关心国内问题转向关注外交关系,注重研究西洋国家,大胆宣扬具有世界眼光的文化思想启蒙之学。探索从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脱颖而出,寻求图强救国、文化维新的民族复兴之路。这些勇于披荆斩棘向前探索的知识分子们,在中华优秀主流文化的传承之路上,树立了划时代的伟大丰碑。

我们在简要地回顾了自宋代以来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演变历程后,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宋代理学与朱子学、明代后期的卓吾之学,以及清代后期的文化思想启蒙之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后文化传承的主要脉络,他们的探索创新代表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

二

在清代后期中国文化思想的激变中,走在最前列的无疑就是林则徐。清代中后期,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阶段,无论是从政治体制、社会经济,以至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处于暮气沉沉的腐朽没落状态之中,危机四伏。尽管如此,从中央最高统治者到各级官僚,以及一般的知识分子,依然沉浸在天朝帝国的梦幻之中。保守僵化与愚昧颟顸,成为文化意识的常态。而当突然面临着西方殖民者的凶猛来临,或是举手无措、惊慌失措,或是盲目抗拒、徒托空言。

在这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林则徐受命前往广州处理禁烟事务。林则徐敏锐地意识到,此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对手,是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对手。要与船坚炮利的西方殖民者相抗衡,就必须要放开眼界,对世界的新格局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改变思维及传统文化的成见,

适应新的世界环境与新的时代挑战。因此他到了广州之后,一方面处理与英国商人的鸦片交涉,加强前线的防务,另一方面则积极了解西方世界的基本情况,搜集各种有关西方世界的文献报刊。如外国人在澳门等地出版的新闻纸《澳门新闻纸》、《广州纪事报》、《中国从报》(又称《澳门月报》),以及西方出版的《各国地图集》、《各国律例》、《世界地理大全》等。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的情景,他还组织人力翻译澳门报刊,选编《澳门月报》,译西方地理学著作,编为《四洲志》一书,扩大了中国视野,对后世影响很大。著名思想家魏源继承他的工作,编写《海国图志》一书,为中国人展开了整个世界的画卷。

为了抵御英国殖民者的武力挑衅,林则徐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国防思维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国际战争环境,因此他又努力从事枪炮战船仿造西洋的整饬工作。早在1840年即道光二十年二月间,林则徐就从美国罗素洋行手中,购买了商船“吉赛皮克”号,作为清军水师演习攻击英舰的训练之用,后又把它改装为战舰,配备英国制造的大炮34门。这是中国从国外引进的第一艘现代化军舰。^③与此同时,林则徐精心搜集中外多种战船资料,制成不同图式以便制造。其中《花旗船图》、《安南国鱼船图》、《安南国大师船图》、《安南大头三板图》、《车轮船图》等,均模仿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船式。即使是他被罢官之后发配各地之事,依然念念不忘整饬新式军备,一再强调炮与舰的重要性。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与英国殖民者的抗衡中,已经认识到了建立可以出海迎敌的海军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一再提出了这样的主张,所谓“窃谓剿夷而无船炮,是自取败也。”^④从长远的战略构想看,强大的船炮水军是保卫国家所不可忽视的:

今燎原之势,向迩愈难,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画,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鳄屏鲸,舍此何济!^⑤

林则徐对于建设海军的这种远见卓识,无疑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人。他是当之无愧的在传统中国文化氛围内可以“睁眼看世界的第

一人”。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家乡福州的许多后人、亲属、友人以及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们,纷纷投身到“睁眼看世界”的行列中去。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图强以及其后的维新图强运动正式登上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图强维新思想也相应地被推到历史的前台。福建知识分子在图强维新思潮兴起过程中,表现突出,贡献巨大。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楨等人是中国维新图强的主要实践者之一,严复是福建也是全国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维新启蒙思想家之一。除严复外,在福建图强维新思潮兴起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还有林旭、陈宝琛、陈衍、陈璧、林纾等人。甲午战争后,严复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他首先翻译了赫胥黎论文集中的一部分,取名《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1894年至1909年的十多年间,他还先后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著作,这些著作的译介,不仅在当时振聋发聩,而且深刻教育、启迪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整整一代热血青年。毛泽东曾将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一道,作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⑥

无论是林则徐、沈葆楨,还是林纾、严复,他们都自许为一名儒者。但是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期,他们却敢于冷静地对待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学,寻找可以拯救家国的全新学说。因此我们从严复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对进化论的热情倡导,对“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民主政治观的推崇,以及极力宣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思想。严复认为实现国家自主自强的根本在于利民。因此,他特地撰写了《原强》一文,提倡全面发展人民的力、智、德,来振兴国家。首先是鼓民力。严复认为提高全国人民的体质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他说:“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民智者,富强之原。”他认为“西方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严复所谓的“新民德”,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来代替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作为一位受过良好而又严格的儒学传统教

育出身的学者,敢于一反传统,积极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敢于把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看作是民德的摧残者,是民族危亡的社会原因,敢于对君主专制鞭辟入里的无情批判,对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热情倡扬与向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不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⑦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严复的文化贡献及其社会思考,依然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其学说必然产生深远的时代影响。

三

我们只要简要地回顾一下自宋代以迄清代后期中华优秀主流文化的传承历程,就不难看出,从宋代理学、朱子学,到明代后期的李贽卓吾之学,以至清代后期以福建知识分子群为主要代表的文化思想启蒙之学,无不标志着中华文化中所蕴涵着的勇于突破传统、创新进取的宝贵精神,为中华优秀主流文化的传承树立了三座无可替代的高峰。虽然说在近现代的学术研究中,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宋代理学朱子学、明代卓吾之学,以及清代后期的文化思想启蒙之学割裂开来,很少去探讨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然而我们跨越自宋代以迄清代末期的近千年时空界限,就能够清晰地认识到,我们今日所被人为割裂的朱子学、卓吾之学以及近代的文化思想启蒙之学,他们在突破不合理传统,勇于创新进取的文化精神上,是完全相通,甚至是一脉相承的。其文化思想价值是中国其他区域文化及儒者们所无法比肩与跨越的。

从这跨时空的视野出发,我们对于林则徐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史上的地位,就不能不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虽然说,林则徐在当时对于“睁眼看世界”的深度和广度是有限的,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反思与启蒙远不如他的后辈们来的完备和具有系统性。但是,敢于率先突破固有

的文化思维,探索新的适应时代变化的图强之路,其艰辛困难是后人所难于想象的,其阻力的强度是后来者所无法比拟的。正因为如此,林则徐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中国传统主流优秀文化传承重要转折时期的“筚路蓝缕”之功,应该被永久地载入史册,为我们后世所敬仰和继承发扬。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八九月份中曾多次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⑧我们今天纪念林则徐诞辰230周年,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刻,从林则徐到当代千千万万中国人对于民族复兴的追求,正是基于这种“自强不息、薪火相传”的文化精神,得以克服千难万阻、不断前进。可以预见,有了这样的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一定能够实现。

注释:

①参见陈支平:《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以朱子学、理学为例》,文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3期。

②参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卷1,《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停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杨国桢:《林则徐传》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95增订本。

④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底稿,林维和藏,《林则徐信稿》第5页。转引自杨国桢上引书第455页。

⑤林则徐:《复苏鳌石书》,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于洛阳。

⑥参见陈支平主编:《福建历史文化简明读本》第五章,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⑦同上注。

⑧习近平2013年9月26日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的讲话。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国学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张燕清)